文化思语

小众狂欢 大众关注

姜 范

向公众敞开怀抱，承担培养观众提升审美水平的责任，电影节责无旁贷

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尚未开幕，抢票大戏已经火热上演。开票1分钟破100万元票房，总票房超过600万元，创下了北京电影节的新纪录。

单看数字似乎不够有说服力，600万不过是一部普通影片票房的零头。但这个600万，只能靠抢，结果是不无残酷的“手慢无”。举个例子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8部作品套票，在46秒内被抢购一空。如果手不够快，喝上几口茶的工夫，就可能和心仪影片擦肩而过。这些片子可不是影院主推的热门大片，它们的放映场次很少，多的不过3场，少的只有1场，过了这个村就真没有这个店了。

被热抢的宝贝，是电影节中“北京展映”单元的影片。各种电影节的流程大同小异，离普通观众最近的就是其中的展映环节。由经典老片、国际知名获奖影片、杰出影人、个性新作组成的展映，覆盖各种类型，兼顾艺术与技术，自然成了电影节中人气最旺的板块。今年的“北京展映”更是让影迷大呼过瘾，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，来自不同国别、不同类型的500多部影片将在北京30多家影院轮番上演。这500多部影片，并非为文艺青年量身定做的小众爱好。有杰出电影人张艾嘉、大卫林奇和安东尼奥尼的作品，有《日瓦戈医生》《乱世佳人》《勇敢的心》的经典修复，有《速度与激情》《加勒比海盗》《泰坦尼克号》为代表的商业大片，还有《似水流年》《小城之春》《鼓书艺人》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等老电影。这样的影片布局，足以涵盖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观众，成为观影爱好者的节日也就不奇怪了。

如今的观影渠道早已多种多样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依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体验。“70后”大多通过黑白电视看过电影《两个人的车站》《办公室的故事》，现在可以借着电影展映的机会，到电影院怀个旧，看看昔日小屏幕里的故事放到大银幕是怎样一种感觉。1939年上映的好莱坞大片《乱世佳人》，1940年曾在上海连映40多场，今天的绝大多数观众都没有在影院观看的机会。时隔70多年，可以在电影院里看《乱世佳人》，仿佛电影又造了一个穿越时空的梦。

更可贵的是，展映环节的影片弥补了当前电影市场类型单一水准参差不齐的不足。不同风格的500多部展映影片，比起电影院里一年上映的影片总数都要多，风格类型也更加丰富。这些影片来自专业人士的选择和推荐，不受票房成绩的束缚，其质量普遍高于影院上映的影片，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欣赏高水平电影的机会。从票价看，展映影片的票价与平时影院上映影片的价格持平，算上一些渠道的优惠，到手价相当公道。如此亲民的盛宴，让公众感觉看得见够得着。

向公众敞开怀抱，承担培养观众提升审美水平的责任，电影节责无旁贷。有人说，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，观众与电影之间的互动，不只是一味地取悦与迎合，还应该有批评和提升。给观众一个通过大师佳作了解电影开阔心胸的机会，给电影一个充分展示自身魅力的平台，这样的双向互动才是电影节的号召力所在。让观众学会接纳和欣赏，享受艺术带来的美好和震撼，中国电影才有提高质量的土壤和动力。

从小众的狂欢蔓延到大众的关注，一个百花齐放的电影大花园已然在灿烂春光中盛开。没有门槛，不需要很多消费，可群观可独享可分享可回味，过个电影节可比不少洋节实惠多了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魏永刚
责任编辑 李 丹
美术编辑 高 妍
邮箱 jjrbzmzk@163.com

在那个“车、马、邮件都慢”的年代，书信是我们传情达意的重要渠道。曾经的我们是那样期待一封家书的来临，在字里行间，细细品味亲情关怀、家风味道——

家风·传承

尺素传家风

“红宝石婚”的厚礼

武家奉

妻宁可自己不买“新衣”也要履行诺言的大孝之心，使我深受感染

到今年五一，我和妻子就该庆祝“红宝石婚”了。每次打开她四十年前给我的信，心头总是热热乎乎，幸福指数升至沸点。

每次来信，看完后我就收藏起来，迭装在信封中，并作了目录提示。前几天我打开一个名为《山花烂漫》的老信封，恰恰正是我们结婚前十几天的来信，看了让人不觉眼热。

这封1977年4月16日的来信中写道：“最近我这出现一个笑话：有人来提亲。我觉真好笑，我毫不犹豫地打退了，我现在心中只装着一个奉，再好的人我也不去考虑他。……看了你的来信，又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，回到了你的怀抱，在京的一景一幕使我永不能忘。但你告诉我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应当以工作为重，我听你的，保证干好工作，绝不等你来批评我，对吧？”这样的“情”，这样的“怀”，如今看来，颇有几分“悲壮”哩。

既然面临结婚，她在两次来信中都提到了“粮票”的事。“过几天给你寄去粮票，请收下。我去上临时户口能换给粮票布票吗？米能买到吗？来信告诉我，不然去吃什么？”下一封来信又紧盯着问道：“粮票收到了吗？可将咱俩的粮票存起100斤，作为咱们安家的储备粮，我去时再带点面去，或带粮票换点，最好先别动那粮票，因办完事后我想叫妈妈去咱那住一段时间，连看病带养，你早先是同意的了，可千万别变。吃粮不用你管，经济紧点我不买衣服这事也得办。困难是暂时的，不要成为负担吧。”

深夜捧读着这些文字，就像四十年前的情景再现。她的字迹一映入我的眼帘，好像触摸到了她那炽热的内心，感觉到了她那急切的期待。哪怕是其中的涂涂改改，也能看得见她的真性情与心理活动过程。

尤其打动我的是，她在结婚之前就提出接母亲来京养病，宁可自己不买“新衣”也要履行诺言的大孝之心，使我深受感染，也非常乐意与她共同践行“百善孝为先”的理念。她还在信中多次“表态”：从每月32元钱的工资中拿出12元让我还账，因为我为给自己的父母看病，欠了800元债务。领结婚证那天，我用自行车带着她，花6块钱给她买了一件瓦蓝色衬衫，她还说“何必呢、何必呢”。说实话，就为这一“孝”一“俭”，我也要感谢她一辈子！

如今，她在万里之外给女儿照料孩子，倒是几乎每天与我“视频聊天”，但那镜头视窗却是一晃而过，留不下墨香，留不下端详，留不下斟酌。面前的这些信，每个字都透着感情，每句话都带着温度，每一封都会使我感动。从信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她当年的音容笑貌，仿佛感受到她传给我的缕缕温情与精神滋养。

女儿已网购了机票，五一我要飞往悉尼。我会把妻当年的来信带几封过去，为我们的红宝石婚庆献上“厚礼”！

家信里的“唠叨”

石志新

不论是在信里还是在生活中，父母总是把“为人要谦和，做事要勤快”的家训挂在嘴边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参军到了山西平遥的炮兵某部，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离开家的时候，父母将我送到村口，并千叮咛万嘱咐：到了部队要谦逊和气，勤快一些，听部队首长的话。

那个年代，不像现在联系这么方便。别说手机，整个村子里连一部直拨电话都没有。和家里的通讯联系，除非家里有特别急的事发电报外，一般情况下，都是靠手写的书信交流。

记得刚到部队的第一年里，父母特别挂念我，几乎每隔一两个月，就能收到父亲亲自写的一封家书。家书中，除了一些挂念的话语外，就是反复嘱咐我离家时的那一番话。在回信里，我把自己在部队生活的成长过程详详细细地告诉父母，让他们放心。在那个感情质朴的年代里，书信交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真挚的情感。

参军后的第三年，我考上了军校，父母得知消息后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给我的回信里除表达兴奋的心情外，还特地嘱咐我要好好做人，千万别自高自大。母亲还让父亲在信里加上她常说的一句话，“骡马大了值钱，人大了不值钱”。

不论是在信里还是在生活中，父母总是把“为人要谦和，做事要勤快”的家训挂在嘴边，时时刻刻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行为细节，也时常表达出希望我能把这一良好家风传递下去的愿望。

现在，我的女儿也已大学毕业。每次在电话或微信里与她交流时，我仍然按照父母当年给我写家信的规矩，嘱咐她做事先做人，为人低调谦逊。虽然女儿有时也很烦我“唠叨”，笑我“老土”，但我仍然希望我的“唠叨”能潜移默化地感染她，让祖先留下的好家风顺利传递下去。

家中风雨墙

宁新路

新元兄不忍心让家事打扰我，要我一门心思去干工作

我离家多年，平时很少接到父母的来信，所有的信都是专由兄长新元写的。我难以收到父母的来信，不是父母不愿给我写，也不是父母没有可告诉我的事情，而是新元兄向父母和弟妹们有要求，不要随便给我写信；要写信给我，想说什么，由他来写。他不忍心让家事打扰我，要我一门心思去干工作。

实际来讲，家里的难事是不少的。父亲长年患肺心病和破伤风病，十多年间，几乎每年都有几次生命危险，幸而抢救及时，没酿成大事。我在外地，姐妹俩和弟弟又指望不上，照料父母的事，都落在了新元兄的肩上。父亲病重时的任何一次住院、抢救，兄长没有叫我回来过，全由他一人担当了。

父亲的病，是我时常牵挂和焦虑的事。老家没电话，我又好几年回不了一趟家，要知家里的事只能靠信了。一个人在外地，时常孤独和寂寞，一旦想家心切，就盼起信来。盼得焦急，可偏偏就没有信来，偶尔来信，那也是新元“精心”措词写的。他的大多来信写得很短，多为“家人一切平安”“安心工作，不必挂念家人”等抽象的常话。也有写长信的时候，但这样的长信，一般很少说家事、道忧愁，大都是谈做人做事的道理，透着兄长的深情期望和关爱。由此，盼兄来信，成了多年来生活中的重要事。

也有很长时间不来信的时候，准是家里有什么事情，他在暂时瞒着我。好不容易盼到他来信，已是事过境迁，兄长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而已，好像在告诉你一件很轻松的事似的。比如，多少天前，父亲病重住院了，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，医院是怎么抢救的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病情好转已出院了。手捧来信，让人又惊又喜。

后来，新元家里有了电话，我们从此不再写信。虽然可以给他打电话询问父亲病情，但新元兄的家在城里，父母在乡下，还是直接跟父母和姐弟通不上话。我要询问父亲和家里的事，新元兄的回答通常是避重就轻，要么告诉好的消息，要么什么也不告诉你，他怕打扰到我的工作。兄长，就是家中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一道墙。

从“抵万金”到“胜万金”

张乐天

当家书里的中国故事传遍世界，中华美德深入人心时，我们不由得感叹家书“胜万金”了

2011年10月8日，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成立，我们开始在全国搜集各类民间资料。半年以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们搜集到一对北京夫妻20多年多达700多封书信。阅读着这批“北京书信”，我意识到书信的潜在价值，并开始“优先搜集书信”。几年过去了，资料中心收藏的家书已经超过35万封。

我深深地被这些家书所吸引。每次阅读家书，总会让我惊奇、兴奋，总会令我沉思、给我启迪。越读，我越感受到家书的价值。如果说当年杜甫用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来描述家书对于因战争而长期别离的人们的意义，那么今天，数量巨大的家书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来说，也足以“抵万金”了。

在当代中国社会中，家书一度是人际交流最重要渠道，并因而构成社会生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。阅读书信，我们尤其关注家书的一个重要特点：正面性。恋人间通信，每个人都努力呈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；亲人之间书写，长辈特别注意用自己“理想型”的人的形象教导晚辈；朋友间交流，总记得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持。正是这种“正面性”使得数十万书信成为提炼优秀中华文化的富矿，总结中国传统美德的素材！

曾经，江苏省无锡市郊区一个农民家庭五个儿子的通信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大儿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考进清华大学，1959年大学毕业以后到沈阳某部队院校教书。其他几个儿子都留在当地，其中小儿子中学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参加农业劳动。五个儿子的通信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80年代，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小儿子的读书问题。大儿子不断地从北京给弟弟购买各种合适的学习资料，鼓励弟弟自修。到恢复高考的时候，小儿子直接报名去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。我从这组书信中看到了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土壤中的传统美德：重视知识、重视文化！即使在“读书无用论”流行的年代，这种美德仍潜在而有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。

长沙郊区一个小业主家庭“六朵金花”的通信反映的是另一个传统美德：无私的互助。这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，大女儿解放初期自己出去参加了解放军，她有了收入以后，就以最大的可能资助家庭，帮助父母抚养弟弟妹妹。第二个女儿1961年大学毕业以后，也每月都给家里寄钱。我们从信中看到，每个女儿都自觉地为家庭作贡献，还相互帮助抚养各家的小孩。

五年多时间过去了，数十万封家书已蔚为壮观。这些书信不仅传递着家人朋友间的殷殷深情，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当家书里的中国故事传遍世界，中华美德深入人心时，我们不由得感叹家书“胜万金”了。